

近代法政人物霍勤燁之事功与心迹

陈 丽

摘 要 | 近代陕籍人氏霍勤燁为光绪庚寅科进士，光绪十八年散馆，签分刑部候补主事，除丁忧外，直到光绪二十七年都供职西曹，其受业于“陕派律学”开创者薛允升，与同寅一起苦心钻研律例，历充奉天司主稿，兼任秋审处行走等职。庚辛之际，他在西安行在刑部除办稿外，还协办赈务，劳苦功高，故被保奏为道员，分省补用。外任期间多受任或署理要差苦缺，政绩卓著，声名远播。其中，署西宁道和甘凉道期间，经办多起刑案，如循化厅王五十六案、武威县民聚闹案等，充分发挥了其刑名特长，展现了其宽仁性格。另外，霍勤燁延续其家族乐善好施的传统，扶危救困，兴学施教；因才情出众，参与修订《甘肃新通志》《续陕西通志稿》等志乘。霍勤燁一生受到中国传统儒学、陕派律学以及西学的相互影响，这些思想根底促进其治事和为人。但在时代变革浪潮中，他展现了保守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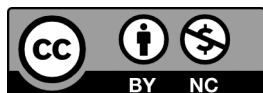
关键词 | 霍勤燁；陕派律学；事功；心迹；保守

作者简介 | 陈丽，1991年生，女，汉族，陕西白河人，厦门大学特任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法律史。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近代法政人物霍勤燁生于陕西朝邑县，为光绪庚寅科进士，光绪十八年散馆后先在刑部任职数年，又在地方任职十年，在事功方面卓有表见。揆诸学界已有研究，2007年，张喜桃按照晚清进士籍贯分布列明霍勤燁的情况，并指出晚清进士仕进呈现重

科举、重正途之特点。^[1]2012年，孙杰以霍勤燁《青门竹枝词》为例，提出西方文明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渗透体现在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2]2013年和2014年，陈光辉在研究清末甘肃统捐时，提及霍勤燁在陕开展大布统捐事宜。^[3]2019年，闫晓

[1] 张喜桃：《晚清进士籍贯分布及分流研究》，湘潭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0、105页。

[2] 孙杰：《竹枝词发展史》，复旦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95页。

[3] 陈光辉：《王树楠与清末甘肃开发（1896~1906）》，载《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陈光辉：《论清末甘肃统捐的开办》，载《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君《陕派律学家事迹纪年考证》^[1]一书以年代为经，人物为纬，摹画整个陕派律学的发展概况，是法史学界首先关注到霍勤燁的作品，但该书只对霍勤燁《悟云轩全集》有几处征引，而未展开具体阐述。

清代刑部为刑名总汇，刑部官员具有研习律学的优越性，“他们既可以从宏观层面掌握国家和地方法律适用的基本情况，也能够对覆核各省题结案件或办理秋审核拟案件的过程中准确探讨律意、掌握量刑尺度、给出情理法有效结合的量刑意见，做到微观层面对司法的精准把握。”^[2]另外，“嘉道以降的经世思潮宽舒了研律的整体氛围，资治致用的律学获得显著发展。”^[3]晚清刑部中正途出身的司员整体呈现较好的专业素养，受时代变革之影响，他们转向对律例进行解说与诠释，涌现大量的律学著作，同光年间形成的“陕派律学”和“豫派律学”，乃至“浙派”^[4]可为一证。此外，清代刑部官员已形成“外放内升”的职业发展路径，^[5]外放后亦能发挥刑名特长，在地方法政实践中成就卓著。晚清法政人物霍勤燁便镶嵌于这一历史背景

下。笔者拟通过本文对霍勤燁之事功与心迹加以阐释。

一、霍勤燁生平及仕宦经历

霍勤燁，陕西朝邑县韦林镇人，清同治六年（1867）十月初九日亥时出生，^[6]民国癸酉年（1933年）“夏历十月三十日子时终”。^[7]字竹汀^[8]，号筱梅，晚号耻盒，^[9]有《悟云轩全集》等文献存世。

（一）出身宦裔，三代进士

霍家乃韦林镇世家大族，《朝邑县乡土志·氏族》载：“韦林镇霍姓：系出武王弟霍叔之后，因以国为氏，元末由晋迁居县境，至今传二十一代。”^[10]

霍家多科甲名士，霍勤燁的高祖声达公和曾祖捷三公都是太学生，其祖、伯、父、兄均有仕宦经历，至勤字辈已是三代进士，闫敬铭有言“吾朝邑二百余年鲜以科第禄位世其家，惟韦林霍氏自南昌公以甲科翰林起家”。^[11]南昌公即霍勤燁祖父霍树清，嘉庆七年进士。道光二十年，入祀名宦祠。^[12]“父兄继起，遂以科第出仕，政学卓然，永为宦裔，

[1] 闫晓君：《陕派律学家事迹纪年考证》，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该书兼涉“豫派律学”，将各历史人物的经历和行谊爬罗疏证，有“合谱”之喻（参见霍存福：《古木含新绿，仙葩吐旧枝——读闫晓君教授〈陕派律学家事迹纪年考证〉》，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20年第4期，第50-56页）。

[2] 张晋藩：《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陕派律学”》，载《荆楚法学》2023年第2期。

[3] 李明：《试论清代律学与经学的关系》，载李雪梅主编：《沈家本与中国法律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48页。

[4] 以往学界一般引述董康和沈家本的记载称晚清律学，分陕、豫两派，但《法界耆宿吉同钧逝世》载“清代法学，分陕豫浙三派”，载《盛京时报》1934年6月27日第6版。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并未将时段限定为“晚清”。

[5] 李明将其概括为“知识—权力”的职业发展路径，参见李明：《知识与权力：清代刑部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

[6] 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二《年谱·悟云轩年谱》，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1a页。

[7] 霍勤燁：《霍竹汀墓志铭并序》，参见魏叔刚、堂斌、陈晓琴编著：《大荔碑刻》，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85页。

[8] 霍勤燁一生爱竹，曾于壬申（1932年）季冬自题《像赞》：“爱竹种竹，倚竹写照。歿为竹神，生以竹号。骨瘦性刚，虚心冷貌。古松老梅，并岁寒操。旧德由存，潜光弗耀。把卷逍遥，入林啸傲。此君与栽，知音同调。清风徐来，欣然一笑。”参见霍勤燁：《悟云轩全集》第1册卷首，《像赞》，西山书局1932年版，不著页码。

[9] 魏叔刚、堂斌、陈晓琴编著：《大荔碑刻》，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83页。另外，霍勤燁晚年写作《耻说》解释命名缘由，“默计一生，不耻忧劳，不耻贫贱之心，遂号耻盒，作《耻说》以自昂”。参见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六《文存·情愫集·耻说》，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17a页。

[10] 朱续馨：《朝邑县乡土志》，邑人穆萼楼刊民国四年（1915年）版，第32b-33a页。

[11] 闫敬铭撰文，雷榜荣书丹：《四川邛州直隶州知州霍君墓志铭》，光绪八年（1882）。

[12] 《清实录》第38册，《清宣宗实录》卷三百四十三，道光二十年十二月甲戌条，中华书局影印1986年版，第222页。

二百年于兹矣。”^[1]霍勤燁的父亲霍为楸,“光绪丁丑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请假归里时正值秦晋大荒,参与闫敬铭主持的赈务活动。“事竣还京,散馆一等,授编修,加赞善銜”^[2],爱好公益,一手主持京城的陕西会馆和朝邑会馆达十四年之久,对同乡多所扶助,“奖励后进,培植士风,殷殷不倦,多所成就”^[3],与闫敬铭交好,家人受闫敬铭提携和眷顾颇多。霍勤燁为霍为楸第五子,进士出身。

霍勤燁族人不仅多出仕,有政声,而且乐善好施、多有美名。霍勤燁耳濡目染,并身体力行,“每诵遗芬,未尝不兢兢焉。追维深慕也。”^[4]

如庚子年陕西旱灾,他与族人捐资买谷,施给同乡贫户;在甘任职期间,扶植教育,并寄送银两,相助亲友。霍勤燁晚年,将参与纂修《续陕西通志稿》过程中搜罗的家族史料和个人记忆融合,自订了家传和年谱,“敬告我后人男女长幼,勉承先德,慎毋忘本蔑祖,下同流俗,忽小节以亏大节,致负祖宗积累之厚也哉。”^[5]

(二)仕宦廿载,青史留芳

霍勤燁自幼浸润于典籍,24岁中进士,实乃青年俊彦。光绪十八年散馆后职分刑部,用心学律;光绪二十七年到宣统三年间外任,经办诸多案件,其中不乏疑件和重案。驰骋官场二十年,学问和事

功并重。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载:“霍勤燁,现年三十一岁,系陕西朝邑县人。由优附生中式光绪十四年戊子科举人,十五年考取觉罗学汉教习,十六年中式庚寅科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八年散馆以部属用,签分刑部候补主事,分奉天司行走。历充奉天司主稿兼司务厅行走。二十六年九月恭赴行在本部报到,充四川司,兼办河南、安徽、广东、广西等司主稿,兼秋审处行走,经会办陕西赈务大臣薛允升奏派办理赈务。二十七年五月遵例报捐候选知府。七月赈务告竣,保奏以道员分省补用,并赏加三品衔,遵例报捐分发甘肃。二十日经钦派大臣验看,二十八日由吏部带领引见,奉旨著照例发往。”^[6]这应是光绪二十七年霍勤燁在西安行在被引见时的履历,年岁不确。据其年谱载,“二十七年辛丑,年三十五岁。”^[5]引见后即赴外任,直到1911年辞官归里。外任期间,署理西宁道,两度署理甘凉道,在兰州总办保甲事宜,委第一次考试法官监试道,到陕西负责大布统捐等事,还参与修订《甘肃通志》。^[6]民国时期,参与修纂《续陕西通志稿》;^[7]纂有《朝邑县志》,“自序”收于《悟云轩全集》中;^[8]创办国粹学社,收徒讲学,扶植伦教,毕业生达11人;还支持宋伯鲁等人创立陕西孔教会,捐洋20元。^[9]

[1] 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一《序·悟云轩历代家传序》,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1b页。

[2] 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一《家传·悟云轩历代名宦乡贤家传》,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3b-4a页。

[3] 同上注,第4a页。

[4] 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6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6页。

[5] 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三《年谱·悟云轩年谱》,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1a页。

[6] 即(光绪)《甘肃新通志》或称(宣统)《甘肃全省新通志》,编纂始于光绪三十三年,安维岳任总纂。至宣统二年,“通志已由安晓峰侍御成稿十之七八,陆续发刊,秘不示人。”其后“通志局安总纂赴京引见,求制军委成其事。奉札督同考核、纂、校事。”参见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三《年谱·悟云轩年谱》,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19b页;卷四《年谱·悟云轩年谱》,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6a、8b页。

[7] 宋伯鲁等纂:《续修陕西通志稿·卷首·职官姓名》中“陕西通志馆职官姓名(民国二十年一月一日遵章改组)”载“朝邑霍勤燁”为编纂;“陕西通志馆职官姓名(民国五年、六年、十二年、十七年四次成立)”载其为“分纂”。“人物志”前四卷末注有“编纂霍勤燁”字样。参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6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7、10页。另外,《悟云轩全集》载有《陕西续修通志人物门序》一文。参见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六《文存·情襟集·陕西续修通志人物门序》,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23a-24a页。

[8] 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六《文存·情襟集·续修朝邑县志序》,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28a-29a页。

[9] 陕西孔教会:《捐助陕西孔教会会费诸先生芳名录》,载《陕西省孔教会汇志》1932年8月第1期第37-43页。

二、刑部学律与行在建功

霍勤燁于光绪十八年散馆后，除丁父忧外，直到光绪二十七年都在刑部任职，属于学习加应用阶段。庚子和辛丑年间，在西安行在刑部勤勉于部务，并襄办赈务而被保荐为道员。

（一）刑部学律：手抄和月课

《悟云轩年谱》载：十八年四月，“散馆，自信写作尚可，不意阅卷者为洪文卿侍郎钧，素多关节，余竟列二等。迨试卷发清祕堂，毫无疵类，见者均代不平。引荐后以主事用，签分刑部奉天司行走。”^[1]虽阅卷不公，但霍勤燁已然认识到刑名的重要，投入到专业学习中，“余畏考试之苦，而刑名亦经世大端，潜心学习。”^[1]《爵秩全览》载霍勤燁在光绪十八年秋为额外主事，^[2]意指在部学习。魏元旷言：“部曹到司，初谓之学习，不能补缺，惟甲科分用，虽学习即食半俸。三年期满，不能者咨回吏部，以原班休致；其能者，由堂官出具考语奏留，仍引见一次，然后降旨留部。立法严密如此，后乃奉为故事，无不奏留，但为一例行之过节而已。”^[3]李明亦总结“通常初入刑部者，在额外主事上学习行走三年后再加考评，若堪任刑部事务，则转成主事，逐级升等。”^[4]霍勤燁即在这样的体制下任刑部额外主事，充奉天司行走。《唐烜日记》载“刑部向来签分到署后，皆由各司之同乡相识者邀往，而具名纸呈堂点派，名为‘拉司’，以后再入他司者，名为‘跳司’，亦或由堂派某司主稿者。”^[5]《西曹旧事》亦载：“司中乌布，自帮印、帮稿以下，均由本司印、稿呈单，

请点彼司之员，请派此司。初到部司员请派本司，谓之‘拉司’，惟刑部有之。”^[6]旨在说明这种“拉司”现象是由掌印或主稿联络自己熟识的新司员加入该司。可见，霍勤燁分奉天司行走，或与其熟识之人共事。

清代进士，大多天资较高，经理部务，若多所用心自然容易出人头地。刑部在人事更换时，“希望多留用本部熟手，并且青睐科甲正途人员”。^[4]刑部每司的掌印和正主稿人选，“皆须正途，不论补缺与否，惟例案熟习。”^[7]是故，进士出身的霍勤燁拥有更大的升迁几率。而成为正主稿后，不仅负责该司所有的议奏，还可以组织自己的人手。

“盖司虽有大小，无优劣之分，稿案皆印、稿自主，不倚书办，故不能禁其求人。必经过印、稿，始能升提、坐，得京察一等。凡刑部京察一等，无不简放，其勤苦为上下所通知也。”^[7]例案熟悉加之正途出身，对升任掌印和正主稿是极为有利的条件。通常业务精通且勤苦，才能成为印君或稿君，进而主导一司稿件和人事安排，并为升迁或简放打好基础。可见，刑部因专业性强，晋升渠道也很明确，这也是激励霍勤燁苦心研读律例的有效机制。

霍勤燁初入刑部时，薛允升为左侍郎，不久升为尚书。部中亦有党蒙等陕籍老司员、吉同钧等同年姻亲。霍勤燁入部受乡贤照拂颇多，尤其是当时陕籍人士多尊薛允升为师，霍勤燁也不例外。霍勤燁编纂的“薛允升传”载明薛“尤好诱掖后进，成就颇多，如赵舒翹、沈家本、党蒙、吉同钧辈乃门生故吏中之杰出者，其他不可枚举”^[8]；所写《十君咏·长安薛云阶尚书讳允升》：“遗泽徧桃李，

[1] 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二《年谱·悟云轩年谱》，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9b页。

[2] 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编：《清代缙绅录集成》第52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3] 魏元旷：《潜园杂编》之《蕉盒随笔》卷四，载林庆彰主编：《民国文集丛刊》第1编第31册，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808页。

[4] 李明：《清代刑部司员的任用规则与权力分配》，载《清史研究》2021年第4期。

[5] 唐烜：《唐烜日记》，赵阳阳、马梅玉整理，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272页。

[6] 魏元旷：《西曹旧事》，收入《魏氏全书》第3函第18册，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1933年版，第4-5页，转引自李明：《清代刑部司员的任用规则与权力分配》，载《清史研究》2021年第4期。

[7] 魏元旷：《西曹旧事》，转引自李明：《清代刑部司员的任用规则与权力分配》，载《清史研究》2021年第4期。

[8] 宋伯鲁等纂：《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七十四《人物一》，详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8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125页。

式微悲藐孤。及门为属吏，知遇感恩殊。”^[1]即说明他亦是薛的门生。唐烜评价薛允升尚书“在刑部数十年，精详谳练，前后无出其右。近年办事有议其骄纵者，大概请托苞苴时亦不免，署中派委差使往往不公，秋审处提、坐、减等，以至提牢各乌布，大半由夤缘而得。”并列武瀛在内的数人，还指明“如此者甚伙”。^[2]吉同钧也说“部中自云阶后，风气渐趋卑污，司员多徇情受贿。”^[3]即说明薛允升虽提携后进，但其中亦有关节。霍勤燁虽称薛允升“人品清正”“处富贵若寒素”，^[4]有“毫毫歿王事，旅况若寒儒”“私谥宜贞惠”等诗句^[5]，对薛的感佩之情溢于言表，显然只刻画了薛的正面形象，而有所隐讳。

清代刑部乃刑名总汇，事务殷烦，“于六部中最为清苦”，许多人熬出资历后只求外放，如《国乘备闻》载：“部务之不振也，曹郎积资十余年，甫谳部章，京察保一等，即简放道府以去。”^[6]升迁之路非常明晰，新任额外主事若想有所作为，确实需要一番苦力。如唐烜曾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初二日“在署买新事《朝审》《秋审》各一部”，^[7]用以研习秋审事宜。霍勤燁也不例外，为得到重用，用心研读律例，律学水平为同侪所羨。其年谱载“十九年癸巳，年二十七岁，研究刑律，入署渐勤，颇承同寅推许，呈堂派充主稿。本司公牍繁难，为阖署最。共分三股，每股主稿一人。”^[8]霍勤燁已在逐步积累资历和经验。

除在部磨练外，这些进士亦可通过考取军机章京等方式改换单位。霍勤燁的父亲是老京官，深谙

个中优劣。他对霍勤燁相期远大，希望他仕途稳进。十九年夏，考选军机章京，“向以年富力强、文字敏捷为合格”，刑部投考六十余人，霍勤燁也在父亲的建议下投考，最为年少。“当堂面试论一道，白折工楷，限四刻交卷，三百字为度。甫三刻，余即呈交，为同寅最。不料薛少司寇因系同乡门生，推满左堂作主，取列十名，录送枢府，以每部额止八人撤退。”^[9]当时薛允升若不避嫌，霍勤燁的人生或是另一番光景。之后，他的父亲甚至建议他去改选知县，勉为循吏。二十年其父卒^[10]，丁忧。二十二年，在丁忧期间，错过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取各衙门司员考选章京的机会。据载，是年七月二十日，刑部送考，“与考共廿三人，取送十六人。”^[11]这一次考录比甚高，霍若应考，当有绝对胜算。

二十三年正月，霍勤燁“抵京到部起复，”是年其读律更为用功，“时馆班知县轮选已过，惟潜心例案，勤慎供职”，隔天入署。

“回寓则教圻、塏两儿读，并读律看稿。又与同寅五六人，立课每月六次，请吉石筌同年同构虚拟问题及疑难案件，各自答问办稿，汇齐评定甲乙。数月以后，颇觉进益。奉天司稿件繁难，罪名又多出入，非别省公牍装点现成者比。余细心阅看，有疑则与掌印、主稿诸君妥商驳正。秋审实缓，人命攸关，初看复看，尤不敢掉以轻心，册不求多，批必从慎。本司现审各案惟虚心旁听，不轻启口，承审者或误，则于退食时婉陈。本部公事，以此三者为大纲，律例为根本，果能精勤，不患不出人头地。余潜心讲求，手抄不传之书十本，颇承同寅推重，

[1] 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十一《诗存》，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18a页。

[2] 唐烜：《唐烜日记》，赵阳阳、马梅玉整理，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71页。

[3] 吉同钧：《乐素堂文集》卷三《薛赵二大司寇合传》，中华印书局1932年版，第二册第21b页。

[4] 宋伯鲁等纂：《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七十四《人物一》，详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8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125页。

[5] 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十一《诗存》，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18a-b页。

[6] 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7] 唐烜：《唐烜日记》，赵阳阳、马梅玉整理，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43页。

[8] 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二《年谱》，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9b页。

[9] 同上注，第10a页。

[10] “京察一等记名道府编修霍为霖据翰林院咨报该员病故，相应知照贵处查照办理。”参见李坦：《知照军机处为京察一等霍为霖病故请知照》，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档案，故机135843号。

[11] 唐烜：《唐烜日记》，赵阳阳、马梅玉整理，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32页。

堂官奖誉。历派帮正主稿、帮办现审兼司务厅。”^[1]

这是他对系统学习律例的详细记述，不仅独自用功研究，手抄秘本，还与同寅一起集中学习。其所延请的吉同钧，律学造诣甚高，考中进士后不久即丁忧，“三年未入署供职，在家埋头读律，手抄《大清律》全部，皆能成诵。旁搜《律例根源》数千卷，并远绍汉唐元明诸律，参考互证，必求融会贯通而后已。学成入署，即越级派充正主稿，从此名重一时，部中疑难案件及秋审实缓皆待君审定，虽职属候补主政而事权则驾实缺员郎之上。”^[2]可见，吉同钧经过严格的训练及长期的熏陶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律学专家，为同僚所看重，霍勤燁与之交好，积极向其学习。霍勤燁与同寅一起的月课坚持了数月而罢。学律加办稿过于辛苦，积劳成疾，触发旧患，“延医调理，时愈时发，精力日疲，不克常川入署，虽印、稿诸君省视敦促，徒呼负负。殆彼苍困我，故于此道无成也。”^[3]

与薛允升不同，同为陕籍人士的赵舒翹升为刑部堂官后却不看好霍勤燁。刚毅和赵舒翹主管刑部期间，力图革新，注重对司员的考察，后继者亦继承这一传统，“勤加面试，并令各作说帖，畅论公事呈览。则其律例之通否，才情之优绌，文笔之高下，心术之仁刻”都在长官的掌握之下。^[4]而“少孤贫力学”、精通律例的赵舒翹尤重考核，二十四年八月由侍郎升尚书。^[5]“展如到任，查明江苏司印稿有受贿之事，即奏革二人之职以示警。又以案牍积累，由司员不谙公事，分日面试各司员律例，扰尤超拔。又革奔走夤缘恶习，凡来宅拜谒及送礼物者，概不准门丁上达。”^[6]即革新薛允升时期

形成的请托风气。^[7]霍勤燁也评价赵舒翹，“素娴法律，而矜矜自负，与余意见不合。本司印、稿请派余帮正主稿，赵谓余文弱多病，不能耐劳，另派别司一人，印、稿再三争执，卒请派余。余感同寅雅意而恶堂官之词色，约定到司办事，不轻上堂。后值覃恩，查办大减等，赵谕律例馆、秋审处诸君，公同密保数员以便擢用，馆中以余前列，被驳；不久添派，复切实保荐，仍未准行。合署啧啧，诧为异事。余自审无他，安命而已。”^[8]“安命而已”四字反映了个中无奈，霍勤燁曾与同僚研读律例，应具有一定的专业基础，故掌印和主稿请派其为“帮正主稿”，律例馆和秋审处还保荐霍查办减等，但因种种原因，霍不得赵舒翹好感。“合署啧啧，诧为异事”，当是众论。笔者认为，赵舒翹其人身躯伟岸，加之出身贫寒，读书刻苦，办事勤慎，严于律己，入署既勤且早，考核司员频繁，对于霍勤燁这样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爱好交游、疾病缠身而不能常川入署的仕宦子弟有所反感似有一定的道理。加之当时刑部人才辈出，其他司员为了仕进也同样勤苦，资历和名望优于霍勤燁的大有其人，如老吏曾鉴、其同年吉同钧、董康等人。其中吉同钧被赵舒翹赏识，“入部三年，即蒙赵尚书派充奉天、四川各司正主稿”，还“派充皇城工程监督”。^[9]赵舒翹自尽后，吉哀叹“知己之沦胥”^[10]，在《薛赵二大司寇合传》直言“假令展如尚在，余虽为之执鞭，亦所愿也！”可见吉同钧对赵舒翹的感激与尊崇。^[11]

霍勤燁因不被赵舒翹赏识而颇有微词，如称其查办义和团“依违不决”，面见两宫时“嗫嚅

[1] 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二《年谱》，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13a-b页。

[2] 吉同钧：《乐素堂文集》，闫晓君整理，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32页；又见吉同钧：《乐素堂文集》卷七，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23页。

[3] 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二《年谱》，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13b页。

[4] 吉同钧：《乐素堂文集》，闫晓君整理，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70页。

[5] 唐烜：《唐烜日记》，赵阳阳、马梅玉整理，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139页。

[6] 吉同钧：《乐素堂文集》，闫晓君整理，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66页。

[7] 唐烜：《唐烜日记》，赵阳阳、马梅玉整理，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144-145页。

[8] 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二《年谱》，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15a页。

[9] 吉同钧：《乐素堂文集》，闫晓君整理，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57页。

[10] 同上注，第58页。

[11] 同上注，第67页。

以对”；^[1]自尽后，霍勤燁“持香烛往吊，弗受，云系遗命。”由此评价“此公矫矫自矜，崖岸过峻，生平傲睨，拒绝交游，善言不入，以致得祸，死犹如此，可谓惑矣。”^[2]这三处记载，即对赵颇有指责，但当赵舒翹被列为祸首，霍亦慨叹“出人意表”，^[3]充满了同情。

（二）行在建功：办稿与赈灾

当然，霍勤燁等人能够回陕，在西安行在得受重用也得力于赵舒翹。赵舒翹先批准了他们请假回籍，之后又给他们安排部务。

二十六年庚子，大沽炮台失守后，霍勤燁“与吉石生、萧小梅两比部各缮请假措贲呈，往谒赵大军机面，决行止”，经多方努力，“赵谕批呈准假，且令速行”，^[4]并安排他们照顾自己的眷属同行。霍勤燁一行，一路坎坷，勉强西归。

因情况危急，行在人员短缺，霍勤燁等人的仕途迎来了转机。“八月杪，圣驾入关，余与石生偕赴西安。九月初三日到省，两宫亦于是日驻蹕北院，设六部公所于考院。旋至本部报到。”从《缙绅录》可见随扈的刑部人员较少，霍勤燁乃为数不多的办案人手之一。

“逐日到部，时诸事草创，吏役全无。自五月后部务停搁，各省奏咨文件均陆续贲送行在，堆积盈屋。堂官惟赵展如一人，议分十八司为四大股。派余充四川司正主稿，兼办河南、安徽、广东、广西四司为一股。以材力竭蹶坚辞不得，乃约同寅数人雇觅书手、杂役清理赶办，分别缓急轻重，汇十案为一稿，叙次简明，以期妥速，其最要者携回灯下撰拟。惟相距七八里，往返过劳，遂移寓梁家牌楼。时警报频至，人心惶惶，同寅多耽游戏，不肯办公，余苦心联络，力任先劳，幸得二三同志相助，

月余始渐就绪。赵堂自知获咎，永不到所。薛云阶夫子本法律大家，复授本部侍郎，以余勤能，颇蒙嘉许，派充总办秋审处兼行时随扈官员，除额俸外，并给津贴。”^[5]

这段文字表明霍勤燁在行在刑部受到了重用。霍勤燁在艰苦的条件下，不仅勤勉供职，还以身倡率，劝说同僚一起协助部务，使得堆积的案件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吉同钧亦载“百务皆归草创，万端方待经纶。（当是时，千官雾散，百吏星稀。多方召集，渐次来归。粗分六部，整理万几[机]。）”^[6]这反映，光绪二十六年，行在刑部事务主要由赵舒翹安排，之后赵自顾不暇，又由薛允升主持。

之后，陕西大旱，清廷指派薛允升总其事，霍勤燁和武瀛又谋得了赈务文案处差使。一方面，霍勤燁及其家族积极募捐，为属员表率；另一方面，霍勤燁尊薛允升为师，过从甚密，提携之故，因而得到了这个机会。霍记载：“余捐银若干，并劝家中各房凑捐百余金”，“仲兄代理长寿县篆，捐助本县赈款五百金。”“先是云阶师以赈务文案乏人，奏派余与富平伍仙航副郎瀛兼理，固辞弗允。附设赈务文案处于本部，不支薪资，不用吏役。缮拟文牒皆与仙航悉心酌办，有要事则赴云师寓宅禀商。”^[7]这两则记载乃是明证。

另一边，八国联军入京时，将很多民众随意拿到刑部，“无可办，又不容释，散押空屋，几不能容。”霍勤燁表明“余由是不愿供职刑曹，及作地方官矣。”^[8]霍勤燁因时局动乱而坚定到地方任职的决心。为募集赈款，清廷放开捐纳，减轻数成，准奖实官，霍勤燁“乃凑集节存款，并仲兄前捐五百，共千数百金，请奖候选知府。”^[9]赈务告竣后，已是刑部尚书的薛允升以文案霍、武二员

[1] 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二《年谱》，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16a页。

[2] 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三《年谱》，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1a页。

[3] 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二《年谱》，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19b页。

[4] 同上注，第17a页。

[5] 以上见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二《年谱》，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18a-b页。

[6] 吉同钧：《乐素堂文集》，闫晓君整理，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页。

[7] 以上见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二《年谱》，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18b页。

[8] 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三《年谱》，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1b页。

[9] 同上注，第2a页。

随折请奖，清廷下旨“予员外郎武瀛、主事霍勤燁，优叙。”^[1]其年谱载：“余则请以道员分省补用，并加三品衔。”“人皆诧为优异，不知部务倥偬，兼办赈事，人数极少，又无薪费，是以邀准。若中丞随折保奖过多，或未到陕而厕名，人言啧啧，无怪下部议驳也！”^[2]《悟云轩全集》载有《拟会办陕西赈务大臣刑部尚书薛覆命奏稿》，可见薛允升的奏稿乃是霍勤燁为其草拟，其中随折请奖二员之事似有苞苴，因而霍遭人嫉妒与怀疑乃是常情，于是极力在年谱中为自己剖白。

霍开始交卸并呈报离署，“捐指甘肃，费四百余金”，八月初四日，带领引见，慈禧“训以到省后办事认真，实事求是等语。”^[3]在与同寅交好钱游后，领照回里，再绕道入蜀诣兄霍勤炜，小住月余后入甘。光绪二十八年，霍勤燁又因“随扈案内奏请从优议恤，得加二级。”他是一个矛盾体，曾为外任一事颇费周章，而当“京友来函，谓余若请托可得二品衔”，却及时砥砺自身——“噫！天子蒙尘，人民涂炭，诸臣皆应得罪，敢望非分耶。”^[4]即从大义层面抵制私欲，可见其行止有度，操守有常。

霍勤燁通过刑部历练和行在办事，拥有较高的律学水平，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是故外任期间处理狱讼游刃有余。

三、外任期间的政法实践

霍勤燁自光绪二十七年命下以道员分甘肃补用后，此后十年，一直在今甘肃、青海和陕西三处任职。多被临时委派或署理的要事、边缺和苦缺，考验和锻炼俱存。

（一）总办保甲与宣讲律例

二十八年正月，霍勤燁抵达兰州。三月末，

其贸然见到了陕甘总督崧蕃，因与崧蕃诗歌唱和，“颇承眷注”。“制军先与藩司商酌，拟委余大学堂，尚未开办。旋派总办四关保甲差。”^[5]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份差使，面对百事废弛的局面，霍勤燁制定章程，有条不紊地行事。“以察奸禁暴、惩赌博、戢盗贼、防火患、清街道为要。不许妄受词讼，擅用刑责。稽核勤惰，昼夜督查。各员均不悦，同班亦訾议。乃以章程商诸臬司，并详咨立案，许以出力请奖，怠玩撤惩，苦口劝导，始渐帖服。商民知于众有益，毫不梗令。”他还通过宣讲圣谕和律例以教化民众。“并筹款雇派讲生宣讲圣谕律例，遍历各街，以裨风俗。遇有恃强倚势，玩法欺民者，从严惩办。”其中，重点解决了回匪鸡奸良民和首道轿夫诱赌索债强抢车骡两个大案，“由是奸豪敛迹，院司称服。”^[5]保甲乃地方基层治理的重要组织，亦是清朝长期奉行的基本制度，事关一地的治安和风化。霍勤燁办理保甲事宜奉行德主刑辅之策略，除制定章程飭令一体遵循外，重点防治赌博、贼盗、火患和整顿街道卫生，通过解决两大要案，捍卫了法律的威信。还雇觅讲手宣讲圣谕和律例，使得民众从内心崇尚美德，遵纪守法，减少纠纷和犯罪，从源头上遏制讼端。并严格约束属员，振刷吏治，以期保甲事宜能够长期稳固推进。

二十八年，霍勤燁还整顿了兰州城内的陕西会馆，“仿先大夫京师会馆法，妥定章程，会同捐助，以身倡率”。^[6]

二十九年正月，霍勤燁到省一年期满甄别，颇得崧蕃赏识，以“‘年壮才明、实心任事’^[7]加考出奏。”二月，霍勤燁即被委派署理西宁道^[8]，“交代保甲局事，绅民公送德政缎牌数副，辞之

[1] 《清实录》第58册，《清德宗实录》卷四百八十五，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丁卯，中华书局影印1987年版，第405页。

[2] 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三《年谱》，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2a页。

[3] 同上注，第2a-b页。

[4] 同上注，第5a-b页。

[5] 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三《年谱》，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4b页。

[6] 同上注，第5b页。

[7] 崧蕃：《奏为试看人员霍勤燁等均已一年期满甄别请各以原官留省补用》，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台湾故宫博物院馆藏清代档案，故机155974号。

[8] “再西宁道英林病故，遗缺查有甘肃候补道霍勤燁堪以委署”。参见崧蕃：《陈以霍勤燁署西宁道片》，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故宫博物院馆藏清代档案，故宫145148号。

不得。”^[1]

(二) 署理西宁道期间的政务实践

清代的道是藩臬两司的分司，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对所属府厅州县的案件拥有管辖权，“如有下级衙门拒不受理或当事人称诉冤枉之案呈诉至道，或系上控之案经上司批审，应即行亲自提审，不得更委下属办理……所辖各府及直隶州亲领地方的寻常徒罪案件，皆由其核转。关系人命的徒罪以及流以上案件则由其提犯审转。”此外，“每年各省办理秋审之先，也应巡历所属各府厅州县，和知府会同讯勘罪囚”等。^[2]西宁道更是一个特殊的设置，据《大清律例·刑律·断狱·有司决囚等第》载“距省穹远之府、州所属秋审人犯，均免其解省”，如其中“甘肃省西宁府所属之循化、贵德、丹噶尔三厅，大通一县，责成西宁道”。也就意味着西宁道分担了甘肃按察使司的秋审职责，“于冬季巡历时逐一亲加研鞫，造册加结移报院司，不必会同该府。”^[3]霍勤燁署西宁道篆期间，充分发挥了刑名特长。《清史稿》载“西宁府：最要，冲，繁，疲，难。西宁道治所。办事大臣、总兵驻。”^[4]霍勤燁也说“辖一府四厅三县，为边要苦寒之区”^[5]，即西宁府、巴燕戎格厅、循化厅、贵德厅、丹噶尔厅、西宁县、碾伯县和大通县。霍勤燁署理要缺，而可支配吏卒甚少，“本道兵备有名无实，仅派戈什哈十人供奔走。”^[6]但他却实心任事，力图革新颓风。

“余初任地方，力矢谦和，详察利弊，徐图兴革，事无大碍，不肯轻易更张。惟以严关防，减行规，约束丁役，接见僚属为要义。谆谆告诫属员，勿轻刑法，勿稽讼狱。王法以治罪人，非为官长泄忿。罪当则杀之不为苛，失当即一板不宜用。小民与己，皮肉一般，痛痒相似，须时时作此想。狱讼亦然。我辈回家与民无异，偶居民上，岂可忘却。并以律例精意，最合情

理，口讲手批，几同讲学。上控多案，酌核情节，批飭录详。若原断错误，逐层指驳，行府提审，或飭厅县更正。间有命盗大案及积年不结者，亲讯速结，不轻用刑。惟通盗害民之衙蠹，提交发审局从重枷责。发审局员正、佐各一，但令先诘原告，词穷即不受理，实有冤抑，须具‘如虚反坐’干结，再为核办，以息诬告刁风。刑名兼日行幕友一人系府幕兼办，约令来署看稿，自行酌改；紧要者，亲笔为之。本署应委厘局，派员必慎，不肖者，或钻营，家丁代求，永不委用。道缺极苦，岁额养廉三千金，署理应领一半又减三成，月计七十余金，另支津贴银百两。”^[7]

霍勤燁除总理行政、司法各项事务外，还注重教化。“本城两书院，肄业生颇多。余观风面试一次，亲定甲乙，捐给奖赏。不时赴院与师生讲论。”霍勤燁亦参与创办新式学堂，“奉文改设学堂，经费难筹，未敢骤变。但为酌订课程，添拨款项，注重于实学。通飭各属整顿保甲，并书院义学，不得仍旧敷衍。并详院咨学正立案。”^[8]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其尽最大努力使得传统书院向新式学堂转变，提倡实学，以求为新政的施行培养人才。

西宁府是西陲重镇，汉回蒙藏等各族人民杂居其间，语言风俗难以画一，为此，霍勤燁“雇觅讲生二人在城乡轮讲圣谕、律例，并与寅僚捐貲重刊铁绍裴观察删《明刑图说》，校正增添，刷印传布。”^[8]霍勤燁还申明旧例，改正地方官办理刑案敷衍塞责之风，“国初番情朴野，轻命重罚，特立番例，声明不得滥用。近来汉回命案，地方官希图省事，强为援引，罚银了结，遂致辗转抢劫取偿罚款，视人命如草芥，盗案因而滋多。余申明定例，详咨通行，非番民自相残杀，不得引用。回汉结怨甚深，回固险狡，亦由汉民欺侮所致。遇有控案，持平详批，亲撰告示，谆谆劝导，并设法安插东关无告穷回，以防溷迹。”^[9]杨红伟、李守良、张蓉、阮兴、

[1] 以上见霍勤燁：《梧云轩全集》卷三《年谱》，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5b页。

[2] 张伟仁辑注：《清代法制研究》（第一册），“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专刊之七十六，1983年，第173页。

[3] [清]吴坤修等编撰，郭成伟主编：《大清律例根原》，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67-1868页。

[4]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六十四《志三十九·地理十一·甘肃》，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117页。

[5] 霍勤燁：《梧云轩全集》卷三《年谱》，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5b-6a页。

[6] 同上注，第6a页。

[7] 同上注，第6b页。

[8] 同上注，第7a页。

[9] 同上注，第7a-b页。

马成俊等学者研究循化厅档案指出,晚清循化厅地方官办理刑案时,杂用番例、《蒙古律例》《大清律例》,乃至援引风俗习惯、宗教戒律等而判决,呈现出“多元异质化的法律适用状况”,并未严格遵循清廷的规定。^[1]正如霍勤燁所言“地处边僻,吏治不修,或讳盗殃民,或以窃为强,或玩视命案,派验勒和,不论情法,一味武断。致习俗渐悍,控案日多。余秉公核办,多所平反,不敢徇私见好,但于僚属不便阴肆讥评,而绅民则甚悦服。惟番案言语不通,夷情叵测。番民好阴行贿,官长易为所欺。余皆批府,不轻提讯,盖虽无自信无他,而难保丁役也。”虽是署任,霍勤燁却为此疾呼申禁,拳拳之心跃于纸上,“符奏章但恐后来者不认真,我尽我心而已。”^[2]如《详督宪请申明番例他族犯案不准引用以维风化》一文即是区别汉族与少数民族相犯、申明例禁的公文。《告示各属绅民遵照条教痛除陋俗》亦属扶植教化、申明律法、减少汉回纠纷之告示。

署任期间,霍勤燁处理了丹噶尔厅王张氏呈控苟平安霸占房屋一案、碾伯县民王三尕上控李永德昧理悔婚一案、大通县黄家寨民与西宁县许赵庄民控争河滩地界一案、循化厅详覆马新庄上控该厅草菅人命一案等。其中最值得研究的是《详督宪据循化厅详报王五十六纠缠董长寿家一案》^[3]。

王五十六案是一桩“以窃为强”的疑案。霍勤燁据循化厅初详判断为窃盗案,但地方官却拟为强盗。此案审转至甘肃按察使司,经陕甘总督批示交由霍勤燁覆查。具体来说,此案先由署循化厅傅丞以强盗案拟为就地正法详报给霍勤燁,霍勤燁据原详“事主禀报并该主簿诣勘情形”指出,“虽结伙持械而迹近偷窃,其余各案是否真正抢劫,有无该犯在内,均未讯究明确,未便以强盗论。即使果有强情,现值地方平定,亦不在奏定新章就地正法之列。姑勿论往返招解拖毙稽延之为过虑也!人命攸关、案情未确,碍难率如所请。”因此驳回,批府移知该厅确讯议详,并札委西宁厘局候补知县李支芳前往循化厅会同傅丞一同讯明。但李令和傅丞不和,各执一词,且傅丞前后两次所详“亦与章程、律例,大相径庭”。^[4]当案件审转至省城时,陕甘总督命霍勤燁再审。霍勤燁由此详覆陕甘总督,就初审适用的法律、认定的犯罪情节和办案程序存在瑕疵三大方面的八

个疑难问题一一剖析。

首先,就适用法律而言,霍勤燁列明了光绪二十四年就地正法章程的适用范围,“除现有军务省分及实系土匪、马贼、会匪、游勇,啸聚薮泽、抗拒官兵、形同叛逆者,暂准就地正法,仍随时奏咨外,其余寻常盗案,一律规复旧制办理,通行在案。此后再未奉有强盗加等治罪明文。”由此表明该案并不适用就地正法情形。而傅丞初详认定的乃是“毫无强情之案”,仅依据“主簿申报,并未讯供”,盲目地“以往返招解稽延拖毙为词”,禀请照章惩办,经批驳后依旧晓晓置辩,还声称“照依新章,整饬风气,辟以止辟,亦非过刻”。显然不合律例和常理。霍勤燁指出“为民父母,舍教养而恃刑戮,用之得当已非政体,况情罪未确,刑罚不中,不徒死者含冤,适令生者玩法,扬沸止沸,何足以云整饬。”再者,傅丞所谓新章乃朦胧说辞,久在刑部任职的霍勤燁对此充满疑问“究系何项章程?何时通行?”之后,他就与案情有关的律条逐一援引剖明,充分展示了其特长。其在“详”中载明:“例载:抢夺聚众三人以上,但经持械威吓及捆绑按捺并伤事主者,为首及在场动手之犯照强盗律斩决,为从发遣。此抢夺加重之通例,全以威吓、捆绑、伤主为重,三项并列,

[1] 李守良:《清末甘肃循化厅少数民族诉讼策略探析》,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2期;李守良:《清末循化厅抢劫案件法律适用问题探析》,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2期;阮兴:《治狱与治边:晚清循化厅的藏族部落纠纷审判》,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2期;杨红伟、张蓉:《晚清循化厅民间“细故”的审理与调解》,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4期;张蓉:《晚清循化厅藏族“重案”审理的理念与成因》,载《青海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马成俊:《清末甘肃循化厅应对少数民族诉讼策略探析》,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2期;马成俊:《晚清循化厅藏族部落纠纷的解决形态》,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4期。

[2] 以上见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三《年谱》,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7b页。

[3] 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八《公牍·巡湟集》,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3b-7a页。

[4] 以上见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八《公牍·巡湟集》,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4a页。

有一于此,情同强盗。若止持械,并无三项情事,即难率引。”而傅丞却说“通行章程但分有无执持器械,并不分有无按殴事主”。乃无稽之谈!霍勤燁说明没有这通章程,进而阐释“章程所以辅律例之不及,何至显相矛盾。情理所无!”然后,他进一步辨明了强盗、窃盗和抢夺之间的区别,“‘盗贼律’强盗最重,窃盗最轻,抢夺则介乎强、窃之间。定有:强谋执有器械、带有火光、公然直至事主之家,攻打门墙曰强;出人不意而攫之曰抢;用力互争而得之曰夺;乘人不知而暗取之曰窃。三者情事各殊,罪名迥异。”并提及转化犯的问题,“其抢夺而例照强盗者,有执持鸟枪,及结伙骑马持械各条;其窃盗而罪等强盗者,有临时盗所拒捕、因窃强奸妇女各条。以其事虽抢窃而情与强盗无异也。”^[1]

其次,就案情而言,霍勤燁分析:事主董长寿乃孤村独户,仅夫妇二人。王五十六原本是董长寿的雇工人,熟悉地形且了解董家殷实,结伙持械深夜爬进董长寿家牵拉牲畜从正门而出,乃秘密入户,罪犯并未撞门而入;案发现场没有油捻等物,即没有带有火光的情节;事主惊醒不敢出房,到第二天清早才查点报案,犯人没有捆殴事主之事;且没有进入卧室,拿走事主的金银细软。由此说明“此种情节不特无强劫之心,且并无抢夺之迹。律以伙械窃,罪止拟徒。如俱系回民,亦有加重定例。”但傅丞却有意在通详内歪曲情节——“以见门爬墙进院即为蜂拥而入;挖门逃走即为强暴显著;至谓事主畏惧未出尚无捆绑杀伤,设事主护财贼捕必不束手就擒。”霍勤燁指责其“抑扬推测,移情就例”,感慨“此法狱狱,世所未闻”。之后,还就傅丞指出王五十六犯有

窝赃之事,霍勤燁评价没有“自盗自藏”之说,其所拟“两犯斩决加拟梟示”亦不适用。^[2]

再次,霍勤燁还就此案程序问题,如“违例私讯”,不与会办人员和衷共济等——指驳。

最后,霍勤燁禀明此案“是否实系起意强劫,抑系仅止偷窃,务得确情”。对傅丞“于此案自逞臆见,不遵成法,始而冒昧禀请,终且过护原详,徒以强词夺理之言,执拗抵制”之处颇为不满,表明“难望其虚心议拟”。是故禀请总督,由循化厅新任厅丞王开斌“迅速赴任,提案秉公讯断”,“抑或另委贤员驰往提讯。”务期案情确切,按法妥办。^[3]

此禀洋洋数千言,论证详细,逻辑严谨。循化厅地方官初审时,不仅没有讯明案情,且拟所适用的律例亦显有错;面对上司批驳,不仅不虚衷研鞠,还砌词讳饰,哓哓置辩,业务能力堪忧;对会办人员的意见也不能虚心听取。相比来说,作为上司的霍勤燁,曾在刑部任职数载,手抄律例,办过秋审案件,律例精通,业务纯熟,对于循化厅傅丞的错误——指驳凸显了其深厚的专业素养和精湛的辩论技艺。

其后,霍勤燁还在西宁道任上接手设立罪犯习艺所事,定有章程。因是署差,霍勤燁当年就离任。在交卸前夕,适值西宁办事大臣准良“派人密查镇道弊政”,霍勤燁“因贵德借支番案马匹章程一案”得罪了准良。准良遂虚构“镇道出行骤用提炉龙头执杖”情节而参奏霍勤燁,^[4]致其被“交部察议。”^[5]

霍勤燁虽在西宁府兵备道上短暂署理,却获得民众的交口称赞,称之为“有谋有智霍青天”,“绅民公送大伞幛联,交口颂扬,谓铁绍裴后数十年仅见者。”^[6]

[1] 以上见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八《公牍·巡渥集》,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4a-5a页。

[2] 同上注,第5a-b页。

[3] 同上注,第6b-7a页。

[4] 参见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三《年谱》,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10b-11a页。“署西宁道霍勤燁出身翰林,敢于以相沿已久为词,弁髦王制,玩视宪章。除将摘取公牌咨行陕甘总督外,应请将霍勤燁飭部照例议处。”朱批:霍勤燁著交该部察议。西宁办事大臣准良:《奏为特参署理西宁道霍勤燁弁髦王制玩视宪章请旨议处事》,光绪二十九年,朱批奏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号:04-01-01-1071-015;西宁办事大臣准良:《奏为特参西宁道霍勤燁玩视宪章请敕部照例议处事》,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录副奏片,档号:03-5426-119。

[5] 《清实录》第58册,《清德宗实录》卷五百二十三,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辛丑,中华书局影印1987年版,第924页。

[6] 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三《年谱》,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10b页。

（三）权甘凉道与妥善化解聚众案件

二十九年冬，霍勤燁回到省城，三十年，“奉委总办省城大城保甲总局，辖分局城门各四，较关外地狭而事繁。”^[1]霍勤燁对保甲冬防事宜也办理得当。三十一年，陕甘总督由升允接任，也颇照拂霍勤燁，先派霍赴陕开办大布统捐，并“嘱令顺便回籍，不必请假”；^[2]至三十三年三月布捐事竣，又“派充督练公所兵备处总办”“会议陕西粮务章程”^[3]等差；九月，霍勤燁抵兰州，又被选为通志局人员；十一月，又奉委会办厘金总局；^[4]三十四年仍负责兵备处事。

三十四年九月，“武威县民因新政苛派催科严重，纠众数千，哄堂殴伤典史，捣毁巡警官物，焚毁诸绅房屋。聚闹多次，道府不能弹压，人心惶惶，电牒告警。”升允将原甘凉道员暨县令、典史撤职，委霍勤燁“权甘凉道篆，嘱藩司传语勿辞，请速往。盖以首道委旧交，恐余不平。”凉州府亦是冲繁疲难之地，霍勤燁在升允手下办理诸多要差，又被派苦差，却毅然受命，“愚民挟愤官绅，被匪诱胁所致，并非反叛。何辞焉！”^[5]面对这起民众聚闹事件，霍勤燁在入城之日，即对绅民两造既申斥又抚慰。莅任之先，“已获滋事首犯陆福基等多名，奉省电飭审解。遂会集府县，先传张典史及诸绅询问始末，飭令赴省候审。提犯研讯，初尚刁狡，继乃供认。外间风传将于半途纠众劫犯，余即备文连卷委府，经张某解赴臬司，并令刘旂官派队押送，以免疏虞。一面亲撰告示，痛陈利害，遇事持平，渐就帖服。

后制军饬将陆匪正法，余分别监禁，勒限严缉逃犯齐振鹭，责成道府督缉。迨匪枢抵凉，其家属欲设奠，余飭县驱逐搬回，不准逗遛。旋闻有匪党数百人藉祭奠为名，希图滋事报复，来已无及。”^[6]一起聚闹事件在他的策略下得到妥善化解，无辜平民免遭牵连，可见霍勤燁办事精详，思虑缜密。

其后，他又处理了多起案件，展示了他的法律素养。如武威县赵宗孟因奸被夺人马捆弔赵福年因伤殒命一案、武威县农民马进贤以偷卖妻子等情控赵发科一案、武威县马厚德因阻弟妇楚氏进城致与儿媳周氏使女更存子服毒身死一案。典型的还有宣统元年正月奉札查办玉昆参案，霍勤燁通过逐一核对账册，悉心研讯，查明确情，为玉昆平反，被赞“精细浑朴”。^[7]后来王步瀛任凉州知府，两人配合密切，解决了西宁县商人罢市事。还处理了轿夫诱赌案，使得赌风息敛，“凉州三害”去其二。^[8]三十四年九月，长庚接任陕甘总督，经过凉州，“濒行以道属上控案数十起原禀”交给霍勤燁，均处置得法，颇受长庚好感，如查明永昌县民联名具控县令杨某勒收折价一案。^[9]

另外，霍在甘凉道任上，还为创办凉州府武威县高等和初等小学堂筹措经费。表明了霍勤燁作为地方官爱护民众、注重教化、实心实力、尽职尽责。

（四）在考试法官工作中起重要作用

霍勤燁于宣统二年三月又回到省城兰州，“仍充兵备处，兼宪政筹备处、通志局总办、陆军财政局会办。”^[10]四月，又为官兵拔毁金县烟苗、穷

[1] 霍勤燁：《梧云轩全集》卷三《年谱》，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11b页。

[2] 同上注，第12a-b页。按照霍勤燁节录之《试办甘肃大布统捐章程》中“设立局卡”目，拟在三原县城设立大布统捐大局；“拣派局员”目载“隔省设局事属创始，非品秩较崇、声望素著之员办理，恐多棘手。三原大局事务繁重，逼近省城，请派道府一员为总办，正佐二员管理收支、文牒、巡查、稽核等事。……以上各员皆须心术公正、操守清廉，又能体恤商情，谙练财政者为合格。”霍勤燁：《梧云轩全集》卷七《公牒》，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13b-14a页。《甘肃大布统捐章程》亦有“慎选熟谙商务，心地诚朴，才具优长者委以斯任，方能联络商情，诸臻妥善”等语，对于霍勤燁被委派到陕西负责大布统捐之事，可参见陈光辉：《论清末甘肃统捐的开办》，《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83-87页。

[3] 霍勤燁：《梧云轩全集》卷三《年谱》，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17a-b页。

[4] 同上注，第19b-20a页。

[5] 霍勤燁：《梧云轩全集》卷四《年谱》，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1b页。

[6] 以上见霍勤燁：《梧云轩全集》卷四《年谱》，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2a-b页。

[7] 同上注，第3a-b页。

[8] 同上注，第4b页。

[9] 同上注，第5a-b页。

[10] 同上注，第6a页。

民求赈不允而殴伤兰州府知府张炳华事贡献了智谋。在军队即将镇压前夕,其对总督表明“金县素无刁风,此中必有原因,逆计为首殴官之人刻已远逃,骤派大兵,徒扰良民。”稟请抓紧医治张炳华的伤,并举荐两员前往金县密查,暂缓开拔军队。“后委员查覆实情,将为首及下手殴官要犯姓名开报缉获二犯正法。张守伤亦渐愈。”^[1]使得无辜良民免受拖累和牵连,再次展现了他的宽厚仁慈和足智多谋。

1910年,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法官考试,霍勤燁参与其中。他记载“八月朔,委第一次考试法官监试道,为新设审判厅,求才乃司法独立基础,体制略似科场办法,则属新创。钦派正副考官、襄校官各二员,不日抵省。”^[2]但钦派官怠惰,考试事宜多依赖地方,霍勤燁实则为此考试的主要组织者,不仅连夜起草考试章程,还担任阅卷、评第、填卷等工作,十分辛苦,只能以“能者多劳”感慨。

其后又被委派修订《甘肃新通志》,霍勤燁拓新体例,促成了该志的完善。

纵观霍勤燁外任十年,虽能力出众、政绩卓著,但一直都是候补道员,仕途沉滞。西宁道和甘凉道都是苦差,在兰州省城,他也多被临时差遣,未补实缺,也未被委任优差,而对仕途有所灰心,“默计到甘以来,优缺、要差及应补之平庆泾固化道一缺俱被上宪徇私,大力夺去,惟创设、查办、僻远、艰苦之事,专以属余。崧、升二公皆旗员贤者,遇

合如是,何论其他。盖食禄有定,人力徒劳。余惟安义命,不恤其他也。”^[3]

除崧蕃和升允外,长庚起初也很赏识他。开始,霍勤燁与长庚情谊较好,后来受人中伤,霍勤燁渐被冷落和排挤,一直不得优差,也没有补实。直到宣统三年三月,长庚才具折罗列霍勤燁政绩并保荐他为提法使,朱批送部引见。^[4]而霍未曾赴京又临危受命再署甘凉道,直至国变。

在行将就木之际,其自撰《圻志铭》载:“盖当光宣之际,学说纷歧,法令繁急,人多躁进贪得,陇右监司尤甚焉!竹汀目击心伤,势同孤立,疆帅明知其材,往往投艰遗大,至称为西北长城。事过又惑于萋斐,实缺优差辄靳之。竹汀又难进易退,世味泊如故,动与时违,半生潦倒。倘所谓天命者非耶!后悟中年任性好高,难免意气用事,乃虚心应物,补过不遑,然而晚矣!”^[5]其中既有遗憾,也有反思。

四、霍勤燁深受陕派律学影响

霍勤燁为官二十年,一半时间在刑部学习,一半时间在地方历练。除自身研习律例外,还与刑部陕籍人士关系密切,尊奉薛允升为师,秉承其流风遗韵,积累了深厚的律学素养和丰富的办案经验,外任时依旧投身于法律实践,为人宽厚,办案精细,为地方倡引良好的风气。

(一) 与陕派人物交谊深厚,相互切磋

客观来说,霍勤燁的法律素养和名望,除个人

[1] 以上见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四《年谱》,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6b页。

[2] 同上注,第8a-b页。

[3] 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四《年谱》,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1b页。

[4] “再甘肃改办统捐较之曩时厘金收数,商民所费省,公家所入多,官私交有裨益。而草创经营实以三原大布统捐为始基,百货皆视作标准。前督臣升允所称执简驭繁无挂漏无烦碎者也。二品顶戴甘肃候补道霍勤燁创办是局,规画一切,备极精详。当其开办之初,隔省设局,官猜商傲,棘手万端。经该员苦心磋商,殚心竭力,始克就绪。其请将平余杂费化私为公,首先报出陋规一万余金以为各局之倡,尤为人所难能。光绪三十二年分,该局征收银数竟达十五万五千余两,全省溢收之款以此为最鉅,洵属异常出力。臣查该员学识兼裕,办事实心,由庶吉士分部当差,嗣又改就外职,所在均有能名。其署西宁道任内审结积年巨案,清理各属冤狱,吏畏民怀。迨权篆甘凉,正刁民聚众滋事,之后弹压扶绥,胥臻静谧。又倡修郡城以资保障。他如学务巡警实业诸要政,亦皆次第整顿,不遗余力,而尤长于理财,抉剔利弊,劳怨不辞。该员本前大学士阎敬铭同里后进,习闻余论,故其综核之才亦能冠绝侪偶,实为监司中不可多得之员。”故奏请将霍勤燁送部引见量加擢用。朱批:霍勤燁著送部引见。陕甘总督长庚:《奏为甘肃候补道霍勤燁学识兼裕请送部引见事》,〔宣统三年〕,朱批奏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奏折,档号:04-01-13-0442-062;陕甘总督长庚:《奏请鼓励甘肃候补道霍勤燁学识兼优办事勤能事》,宣统三年五月初二日奉朱批,录副奏片,档号:03-7454-004。

[5] 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六《文存·情愫集》,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37b页。

努力外,同乡协助亦十分重要。张晋藩总结“‘陕派律学’是清末刑部形成的以薛允升、赵舒翘、吉同钧等陕西籍刑部官员为主体的重要律学流派,其学术贡献是多方面、多领域的”,具体贡献为推出了内涵丰富、固本开新的学术成果,拓宽了中国传统律学的研究方法,促进了《大清现行刑律》的纂修,对晚清及民初司法产生积极影响。^[1]

陕派律学创始人薛允升,“尤好诱掖后进,成就颇多,如赵舒翘、沈家本、党蒙、吉同钧辈乃门生故吏中之杰出者,其他不可枚举。”^[2]“不可枚举”即统称,霍勤燁同样是薛允升的门生,是故一直称其为“云阶师”之类。只是较列举的赵舒翘、沈家本、党蒙、吉同钧四位而言,律学水平没有他们那么精湛,也没有他们在刑部任职时间长,更不同于他们著述甚多,并经手众多大案。但这些差别的存在,并不能否认霍勤燁深受陕派律学的影响。纵使霍勤燁在京刑部任职期间虽不得赵舒翘的赞赏,但庚子、辛丑年间,霍勤燁仍受赵舒翘指派而在西安行在刑部担起了办理四司案件的重担。之后又被薛允升委派秋审处并办赈,因功劳显著而被保荐为道员。其同乡情谊和提携之恩难以割舍。除受薛、赵二大司寇照拂外,霍勤燁与其他陕派人物亦有较好的情谊。他与陕派律学大家吉同钧系同乡同年同曹,亦属姻亲,其兄霍勤炜的原配乃吉同钧族叔吉灿升的女儿,吉同钧的个人日记记载霍幼梅(勤炜),“系多年交好”。^[3]因此,霍勤燁在光绪二十三年请吉同钧作为他们学律月课的讲师,除吉同钧个人律学水平高超外,还因两人关系密切;光绪二十六年,霍勤燁也是和吉同钧、萧之葆等人一同回籍,后又与吉同钧一起到行在报到;二十九年,霍勤燁被准良参奏时,还“函电京友王仙洲、吉石生叙明原委,覆函抄寄片稿。”^[4]

“石生”或“石笙”即吉同钧的字号。吉同钧《乐素堂诗存》记载了他与霍勤燁的交谊,如《寄同年霍竹汀观察勤燁二首》“乱离音信渺,旧好隔山川”“一别长安月,瞬经十五年”等句,即表达两人自光绪二十七年分别后再未相见;^[5]《观察霍竹汀》一诗更是将霍勤燁的个性与毕生经历囊括殆尽——“烛庭风裁峻,一生惟谨慎。少年入词林,旋掌西曹印。观察历三边,西北资坐镇。国变即挂冠,始终抱忠荃。”^[6]表现了霍勤燁性格谨慎,文采斐然,青年在刑部历练,中年外任,政绩卓著,国变后即

归隐。霍勤燁与王步瀛同样交好,两人在凉州亦配合密切,政绩卓著。此外,霍勤燁还与同僚富平人武瀛相熟,曾一起办赈;与三水人萧之葆一生交好,其生圻志便由萧之葆手书。

(二) 在司法实践中详慎宽仁

霍勤燁外任主要在今甘肃、青海一带,虽身处边蔽之地,然而他悉心劝教,更将在刑部积累的办案经历用于实际。其所草创的章程、告示等都是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而其经办的刑案更运用大量的专业知识。从其对王五十六一案的批驳可凸显其律学特色,即对情与法一一剖析,逻辑严明、鞭辟入里、发人深省。而其对教化的推崇,一再宣扬圣谕和律例,不遗余力启迪民智、感化人心,也反映了他崇德、宽仁的性格。对两起聚众事件的化解,充分表现了他对劳苦大众的同情。这一切都说明其秉持经学与律学相表里,德礼为本刑罚为用的法律观,在一定程度上弘扬了陕派律学的特色。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一方面,霍勤燁的事功受陕派律学、传统儒学和西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其清正人品的养成则源于家庭风气的塑造。纵观霍勤燁的外任经历,与其祖父颇有一致之处。霍树清任镇原知县时,兴学劝农,惩蠹役,禁赌会,注重教化,敦品勉学,“教民则宣讲圣谕,谆谆劝导”,杜绝蔓讼;皋兰散赈活动中,“亲查监散,民庆更生”;新淦任上,严拒情贿请托之事;新建任上,“政务殷繁,讼必亲理”,“历任清结旧案,辄千数百起,省释株累,

[1] 张晋藩:《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陕派律学”》,载《荆楚法学》2023年第2期,第24-32页。

[2] 宋伯鲁等纂:《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七十四《人物一》,详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8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124-125页。

[3] 段鹤寿:《乐素堂日记偶钞(十九)》,载《平绥日报》1935年第23期,第7页。

[4] 霍勤燁:《悟云轩全集》卷三《年谱》,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11a页。

[5] 吉同钧:《乐素堂文集》,闫晓君整理,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96页。

[6] 同上注,第336页。

颂声大作。”为此“疆帅学使交章奏荐，先后密保人材二次，大计卓异三次^[1]，派审提省要案，查办各属大狱，奉差奔走无虚日，不以为劳”；署赣州^[2]、南昌等府，办结会匪及械斗巨案，恶风顿熄。^[3]李元春曾言：“功名有数，幸勿希合于进，稍负素节”，霍树清深以为然，“在甘在赣，政绩卓著，循良之称百余年不衰”。公事之余“读书静坐，淡泊寡营，起居饮食，摄养有节，家法肃穆。子孙多以科第成名，尤恶佐杂钻营，切戒捐纳。”^[4]可见霍树清勤于政事，严格律己，既有显著的业绩，亦有良好的道德操守，深深影响了他的子孙后代。

此外，霍勤燁家族拥有好善乐施的传统，最迟可追溯至其曾祖父“性豪侠，好义举，经商济南，尝罄资万金以济人厄。”^[5]其祖伯父兄及其自身都竭力助人。

辛亥革命后，霍勤燁挂冠隐遁，再未踏足政坛，

吉同钧“国变即挂冠，始终抱忠荃”一诗恰如其分概括了其晚年境况。他除精熟刑名外，也才华横溢，是清末民初的名士，所撰《竹枝词》流传甚广。他与宋伯鲁为挚交，晚年参订《续修陕西通志稿》，创办陕西孔教会等都能体现二人的交谊。而其一手创办经营国粹学社，扶植伦常，重视教化，则表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和坚守。其《自挽》写道：“翩翩年少忽衰翁，壮志销磨老境穷。笔砚多情容隐遁，山林何处免兵戎。万般奇巧海成市，半世功名云在空。未必盖棺方论定，是非一笑付齐东。几度沧桑满目新，茫茫苦海一闲身。伤时喜说英年事，作孽当为乱世人。名不须高安淡定，骨非甚傲瘦嶙峋。玉皇倘许依香案，永免他生堕俗尘。”^[6]本就疾病缠身的他，晚年经历了近代史上诸多战乱和纷争，身心备受摧残和折磨。1933年，他与世长眠。春秋代序，世事沧桑，半世功名终成空，是非还待后人评。

[1] 指道光三年、六年、十五年大计卓异，参见韩文绮：《奏请以新建县知县霍树清陞补南昌府同知事》，道光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档案，故机060873号；陈奎：《奏为江西南昌府同知霍树清大计卓异接准部咨行令引见惟该员现在审办之案乏员接署奏请展限引见具奏》，道光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档案，故宫106510号。

[2] 道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护理江西巡抚桂良因赣州府知府丁忧，奏请由南昌府同知霍树清署理赣州府知府，其奏折写到：“赣州府管辖一厅八县，政务殷繁，为江西十三府第一难治之区，必须明干之员往署，方资治理。查有南昌府同知霍树清勤明干练，在江年久，于地方情形素所熟悉，且前经委署赣州府篆务，办理裕如，堪以仍委署理。”桂良：《奏为委霍树清署赣州守等由》，道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档案，故机068105号。

[3] 江西巡抚调任江苏巡抚陈奎于道光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奏明：“江西南昌府同知霍树清于道光十五年大计卓异，接准部咨行令引见，当因该员先经委署南安府印务，请俟新任南安府知府倪良燿到任交卸后再行请咨以免辗转更易，咨部展限在案。兹查新任南安府倪良燿尚无来江确信。该员交卸有需时日，南安府属毗连楚粤，山径丛榛，时有匪徒潜迹其间，该署守缉捕认真，颇资整顿。现据督属拿获逃遣会匪？千孜，匪犯胡毓沅等迭次抢窃，并获逃凶萧老锡等各起要案三十名，应立即飭令该署守分别审办，一手完结，必须半年以上方可竣事。”故奏请延迟霍树清交卸日期。陈奎：《奏为江西南昌府同知霍树清大计卓异接准部咨行令引见惟该员现在审办之案乏员接署奏请展限引见具奏》，道光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档案，故宫106510号。

[4] 霍勤燁：《梧云轩全集》卷一《家传·梧云轩历代名宦乡贤家传》，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1a-2a页。

[5] 同上注，第1a页。

[6] 霍勤燁：《梧云轩全集》卷十一《诗存》，西山书局1932年版，第27a页。